

贯彻二十大精神
铸就文艺新辉煌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赋予马克思主义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刘金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一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深邃的理论思考和宽广的历史视野，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理性更加成熟，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和宽广路径，对于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理论发展新飞跃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历史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而中国实际又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中国当下的实际，即现实条件，当然这种“现实”又是和“历史”复杂关联着的；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际，即包含中国人民历史上创造的物质文明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内容的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构成的中华文明。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悠久历史中不仅塑造了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精神品格，而且涵育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血脉与身份认同。“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扎根生长、枝叶扶疏、硕果累累，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绝不是偶然和巧合的，有其逻辑必然性和文化同一性。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为融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科学论

断，积累了一系列认识成果。毛泽东同志用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进行改造，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将《汉书》中“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实证与考据方法进行创造转化，赋予“实事求是”以新的内涵，用以揭示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汲取中国古代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有机结合的典范。邓小平同志把《礼记·礼运》中的“小康”社会理想进行创新发展，应用于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设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深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为融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呈现出愈加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中国特色。他用中华文化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言必信，行必果”、“德不孤，必有邻”等，深化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倡导弘扬勇于改革的创新精神；用苏辙“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官箴》“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等，论证说明全面从严治党之任务要求；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等，为弘扬民族精神提供理念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大量引用传统文化经典用语，用于问题说明和路径指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渗透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之中，以唯物辩证法去激活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彰显其独有气韵与时代风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其内在机理和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融相通的，中华文化历来倡导的“阴阳合和”“因地制宜”“福祸相依”等朴素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是高度契合的；中华文化追求的“小康”愿景、“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异曲同工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厚重性和包容性的中华文化作为精神母体，将世界性和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根基，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流碰撞、互融互鉴，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为中

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历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传承民族文明精粹，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定位为民族基因、文化血脉、精神标识，用以增强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与方法，用以启迪思维、拓宽视野并增强精神力量，分析解决当代中国治国理政中的一系列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系统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揭示其应有的时代内涵和现实功能，明确指出：“我们从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中国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也进一步提升到新的水平，进入到新的发展境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我们坚持以现代视野接续中华文脉，坚持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制度、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深度结合，又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在新时代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已成为时代发展的热切呼唤，成为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发掘中华文化中的重民本、尚仁爱、崇正义、讲诚信、趋真善等优良素质，系统阐发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理念和道德律条，将中国的历史经验、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精准恰切地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里，通过东方思想和西方文化的深度交汇，促进历史赓续和当下创造的有机融合，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卓异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中国风格，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风采和真理力量。

（作者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学科视野、学统传承与学术眼光

——评李宗刚编的《山师学人视阈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董卉川 张宇

通过学术论文的甄选、辑录，全面展示数十年来山师学人的学术成就，促进山师相关学科的发展。尽管所选论文篇目有限，但也可管窥山师学人的个性与风格。这些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山师学人的不俗实力，亦能够以“集束炸弹”的效果，扩大山师学报的学术影响力。山师学人、山师学派、山师学报三者互促共生，形成了一种开放包容、充满活力学术生态。

重视史料、重视考据是山师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重要特色。以田仲济和薛绥之为代表的第一代山师学人，编撰了“中国现代作家资料丛书”，奠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初的文獻资料基础”（陈思和）。1970年代至1990年代，以冯光廉、刘增人、朱德发、查国华、韩之友、蒋心焕、张桂兴等为代表的学者，汇编了鲁迅、茅盾、老舍、王统照、臧克家等知名作家的研究资料，以及解放区文艺运动、报告文学、期刊编目等重要研究资料，成为该研究领域不可绕过的参考书目。21世纪以来，以吴义勤、魏建为代表的山师学人，赓续传统，分别主编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20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历史档案书

今年是钱中文先生九十寿辰，他的五卷本文集《钱中文文集》出版，其主编的《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三版修订再版。在此多喜交叠的年份，钱中文先生的诸多同仁、好友、学生纷纷向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钱中文是我国老一代文艺家的杰出代表，知名的文艺理论家、文艺美学家，我国当代文艺学的开拓者、引领者之一。其文集的出版和《巴赫金全集》的三版修订，是我国文艺理论界的一件喜事，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文艺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1951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开始，7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钱中文一直怀着对文学赤诚的热爱。如其所说，“文学是我永远的‘乡愁’”。无论是在莫斯科大学四年留学期间，还是在社科院文学所的60余年里，他始终都没有中断对中外文艺理论和美学的探索与创新。他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艺理论的思想与学术探索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84年，他在长文《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中，阐述了文学的审美反映的心理结构、审美反映中的主体创造力、审美反映中的再现与表现，以及审美反映的多样性及其无限可能性等。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我国文艺理论的基本观念，对我国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相关专业的研究发挥了导向性的作用。

此后，在深入探讨了文学的历史发生以及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演进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说。“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说，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力图在不同的生产关系的发展中，历史地追溯它的产生过程。他把审美意识作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是历史的自然生成，是在历史的回溯中看到其生成的过程。他认为，审美意识在长期发展中积淀了人的生存感受与感悟，先在口头形式中获得表现，成为一种审美意识形式；而后融入了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文字，融入了具有独特的节奏、韵律的诗性语言的文字结构，使得审美意识获得了书写、物化的形式，也即成为被文字最早记录下来文学。随着劳动分工的日益复杂化，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进一步过渡，社会集团的倾向、价值、功利的不断渗入，作为原始初发阶段的文学——审美意识形式逐渐历史地生成为为审美意识形态。特别在话语、文字多种结构的样式中，审美意识形态显示了与生俱来的“诗意的审美”与“社会价值、意义、功能”相融合的特征，自律和他律的高度张力之间保持平衡。

“新理性精神”是钱中文先生强调的另一个概念。针对反理性主义消极面的弥漫，新理性精神主张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人类学来审视人的生存意义，重新阐述与理解人的生存、文化、艺术的价值。新理性精神把现代性看作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现代意识精神、一种时代的文化精神。新理性精神把新的人文精神视为自身的内涵与血肉，强调弘扬人文精神，强调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的追求与确认，最终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人的解放。

在近年，钱中文先生笔耕不辍，坚持再次修订数百万字的《巴赫金全集》译稿。在应该颐养天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金元浦

年的年纪，他还在工作。可以说，新版《巴赫金全集》是其对中国文艺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它有助于拓展中国学者研究巴赫金思想的新思路，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钱先生在翻译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理论的对活主义。这一重要的理论思考，开拓了文学理论的新生面。

30年前（1992年），由钱中文先生策划、提议，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河南大学、吉林社科院、湖北社科院、四川社科院等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学会预备大会在河南大学召开。这是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界在新形势下的一项开拓性的盛举，开创了此后30年我国文艺理论、文艺美学、文学批评蓬勃发展的新局面。钱中文在会上提出了“主导、多样、鉴别、创新”的学会方针，明确了既要坚持与发展、团结与对话，更要开拓与创新的发展目标。会后出版了《文学理论：回顾与展望》。

30年来，在学会发展的每一届年会、专题论坛或研讨会上，钱中文先生总是亲自撰写开幕词，亲临大会讲演，引导学会同仁——特别是青年学者——共同创新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新形态。在他的掌握下，学会一直沿着在中外文论对话互鉴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正确方向，广泛团结了中外文艺理论的研究者，培养了一代代我国相关专业研究的青年才俊。他引领学会与各国学者交流交往，参与组建“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带领中国学者站在全球文艺理论研究的前沿。30年风雨兼程，学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其中蕴含着钱中文先生崇高的信念、卓越的胆识、宏阔的视野和艰辛的努力。

钱中文先生在《巴赫金全集》的译序中这样说：“阅读巴赫金，你会深深感到，知识真是一种力量、一种伟力。可是，这一切，又都是巴赫金在流放中、在生存的流离中、在恐怖的不断袭击中、在默默无声的病痛缠身中做出来的。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令人深长思之。俄罗斯的另一位与巴赫金同时代的著名哲学家弗罗林斯基说过一句话，我已记不真切，大意是说，‘一个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他会忍受时代给予的一切苦难与折磨，超越它们，坚持把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思想说出来。我想，巴赫金就是这样的思想家。他的种种独创的思想，都是和着生存的痛苦与屈辱，一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的。……真的，只要世界上还有健全的理性存在，那么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智慧和思想的力量呢？’这是一个有着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面向未知的探索精神、开创新局的扛鼎精神、生而为学者的风骨与才华的大写的‘人’。”

回顾三十余年追随钱先生学习，为道日进，为学日勤，但与先生的要求与期待来看，差距甚巨。我有幸提出并主编先生七十寿辰的文集（2002年），后来延续成例。所以2012年我又参与主编了先生八十寿辰的纪念文集。如今我和方喜又有幸参与主编先生九十寿辰的纪念文集。我是幸运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的赓续、变革、嬗递，其问题意识、知识资源、治学路径、语言表达等方面都形成了范式的转换。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共同的学术倾向。其一是集体兼备。从论文集的选目来看，山师学人对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都有突出的研究成果；启蒙主义、现代主义、叙事学、符号学、女性主义等理论驾轻就熟，与学界前沿成果同频共振。其二是气魄宏大。思潮研究向来是山师现当代学人的强项，不管是乡土小说、历史小说、左翼文学、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山师学人均有代表性研究成果。在论述中，注重史论结合，既把握整体变化趋势，如《五四新小说理论和近代小说理论关系链忆》《中国小说创作主体的审美情感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等文章，也注重传统/现代的关联，而非以二元对立思维看待历史的嬗变与转型。其三是齐鲁风范。在编选时，注意收入关于本土作家作品研究，比如关于王统照、莫言、张炜、矫健、孔孚等的研究。山师学人对这些本土作家的深情回望，饱含了家国之思与文化自觉。

李宗刚坦言，“学术研究成为我的人生展开的基本方式”。这本论文集的编撰，既是“编缘”的再续，亦是山师学人对于山师学派、山师学报的温情检视。这些论文穿越了历史的烟尘，在传承中得以绵延向前，为学术的变与不变留下了一份可贵的见证。

（董卉川系青岛大学国际教育院副教授，张宇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

李迢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日报社原副总编辑李迢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1月2日在西安逝世，享年101岁。

李迢，原名李奎才，笔名也辛，中共党员。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心迹——一个报人的自述》及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杂文、通俗故事等。

沈虎根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出版集团原社长沈虎根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17日在杭州逝世，享年90岁。

沈虎根，笔名季夫根，中共党员。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6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儿童文学集《金枝玉叶》《我这一家人》《小雁归家》《雁·狗·猫及其他》，小说散文集《入党之夜》《没有太阳的日子》《大街小巷》《岁月留情》《书趣无限》，文集《儿童文学使我快乐》等。曾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二等奖等。

（上接第1版）

张象、陈巨飞、常笑予三位学员代表在结业典礼上先后发言，回顾分享了各自的学习收获，畅谈了参加本会高研班的心得体会，表达了对鲁院的感谢和不舍之情。大家表示，在鲁院的学习让人受益匪浅，也深切感受到文学的温暖和力量。时代和生活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素材、启示和可能性。今后在创作中要不断创新突破，努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书写人民的泪水和欢笑，书写勤劳豪迈的人民和浩瀚广阔的时代。

据悉，本届高研班是党的二十大之后鲁迅文学院举办的首届高研班，是鲁迅文学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国作协中心工作，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积聚和培养高水平人才的重要举措。本届高研班的举办得到了中国作协党组的高度重视和亲切指导。为激发学员们的学习热情，鲁院在教学环节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设计和调整，强化对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学，多次组织学员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在保留既有教学框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在课程设置上，涉及领域广、覆盖面大，注重精品化、体系化，力求最大程度提升学员素养，高标准强化学员使命意识，最大容量丰富学员创作经验。高研班邀请不同领域专家学者为学员们授课，给予大家专业上的启迪和指导；邀请知名文学刊物的主编担任学员们的辅导老师，并邀请资深编辑、作家为大家改稿，解答学员们创作过程中的困惑。学员们还自发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学沙龙和研讨，营造了浓厚的对话交流氛围。高研班举办期间，恰逢“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隆重举行，学员们现场观看了这场极具影响力的盛典，领略了新时代文学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深刻感受到文学的价值和尊严，进一步增强了为人民书写、为时代放歌的自觉和自信。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主持结业典礼。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东华及教研部全体教师等参加结业典礼。（鲁闻）

第十一届中国电影史年会

本报讯 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与厦门大学电影学院联合主办，厦门大学音像文献中心、厦门大学电影博物馆协办，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史学研究所承办的第十一届中国电影史年会在厦门大学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本届年会的主题为“国家视野与地方经验：历史钩沉、文化审视、理论建构”，共设有2个主论坛、12个分论坛，学者们围绕民族国家建构、电影钩沉、理论辨析、电影节展研究、地方经验、中国台湾电影、中国香港电影、海外华语电影史、类型电影、媒介考古、文化审视、影人研究展开全面讨论，分论坛均设有点评和互动环节，并开通会议旁听。本届年会的学术放映单元还首次启用了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云上映院技术。

中国电影史年会创办于2012年，现已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高端学术品牌。年会鼓励和鼓励有志于电影史学研究的青年学者，11年来，年会坚持“只看论文，不问身份”的审评制度，是海内外所有致力于中国电影史研究学者公认的高质量学术交流平台。本届年会共收到280余篇论文，最终有95篇论文入选。入选年会的青年学者比例超过76%，创下历届之最。（余非）